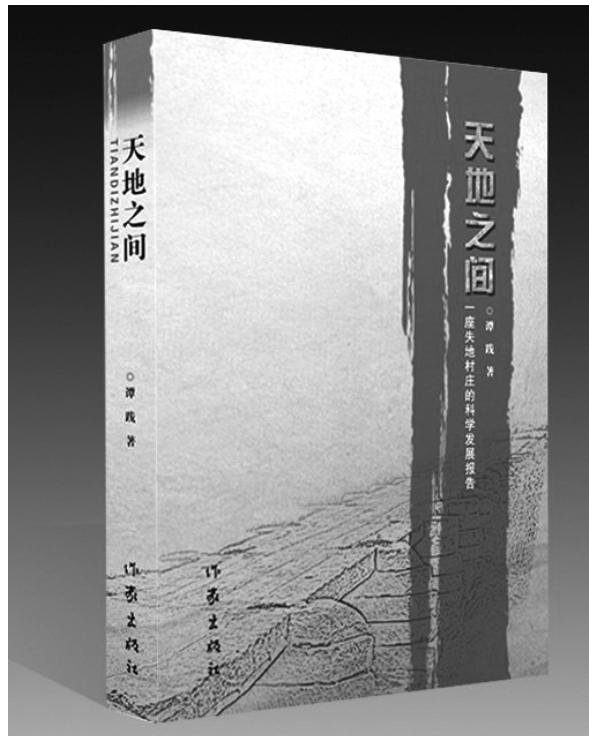


## 报告文学

## 一座失地村庄的科学发展报告(节选)

□谭 践



这是一部宣传正能量、弘扬主旋律的书。作者10年跟踪采访，三载精心创作，真实地再现了泰山脚下一个失地村庄——粥店十几年来艰难曲折的发展变化历程。三千个失去土地的农民，在以党委书记、居委会主任刘梅元为班长的“两委”班子领导下，以坚忍不拔的毅力，从泥潭中抽出身来，励精图治，绝处逢生。而今，这里的居民坚持了10年之久，这里的孤寡病残老幼得到特别关爱，这里的创业者有足够的舞台，这里的居民生活丰足、温文儒雅……

## 血腥一日

粥店村民和某些略知粥店根底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村里发生的一件大事。

那是1992年8月7日。

一个年近半百的村民，以杀猪为业，通常农村把这类从业者叫做“杀猪匠子”或“杀猪的”，此人却另有一个外号“捆天月子”，意思是能耐很大，能够把天捆起来。这天中午，此人独自喝了一顿闷酒，勾起了心中一桩巨大伤心事——儿媳怀孕好几个月了，因不符合生育政策，村里动员着流了产，流下来一男婴。醉意朦胧中，他身着青衣，手提杀猪刀，赶往村委会。此时还不到上班时间，天气燥热，树上蝉儿歇斯底里地叫着，当时分管计生的村委副主任孙玉林正在一个西瓜摊前跟摊主聊天，见了远远走过来的“杀猪匠子”忙招呼道：“二叔，坐坐吧。”二叔凑过来，倒背着手，支吾着，不坐也不说话，猛然挥刀向孙玉林砍来，孙玉林大惊，慌忙躲闪时，胳膊、肚子已中了三刀。孙玉林慌忙逃脱，杀猪匠子又闯进村委会，将会计刺伤，转而回到村内计生主任宋其翠家，将其刺死，随后自杀……

一股血腥气骤然间笼罩了粥店。

一向默默无闻的粥店因而“名声”大振。

时至今日，当我到孙玉林家中采访时，他仍然心有余悸。他说，夜里有时候梦到那天的场景，还会吓出一身虚汗。本来健壮结实的他，经过那一劫，身体完全垮了，成了医院的常客。

这一天是黑色的，是粥店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天。

这一天，将村干部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，谁都不愿干了。一时间，村委会院落变得冷冷清清，空空荡荡。秋风吹过，落叶飘零，严冬似乎早早地来到了粥店。

后来人们将这一天发生的事称之为“八七”事件。

村干部人人自危，村里工作陷于瘫痪。

## 粥店——猪圈？

村子乱成了一锅粥。

最大的“乱源”是土地调整。粥店村当时有人口2810人，耕地2396亩，其中小麦1740亩，果园656亩，鱼池30个，180亩。根据规定，村里每3年调整一次土地，由于个别村干部办事不公，多的是人情地、关系地，你和村干部关系近、交情好，就能分到好地，否则只能任凭摆布。村民意见纷纷，又无力改变，只能用消极办法以示抗议，有的不交提留，有的拖欠承包款，有的乱挖鱼塘……村里的党委会、村民代表会等各種会议，任你强调多么重要，硬是召集不起来。似乎人人窝了一肚子火，像被激怒的公牛，吵架的，斗殴的，骂大街的，处处点火，处处冒烟，真是乌烟瘴气，一团乱麻！村民看不到出路，看不到前途，只能自暴自弃，有几次投票选村干部，有些人竟然将票投给了村里几个“嘲巴”（方言：傻瓜）。

几家小规模的村办企业建筑公司、石灰窑厂、砖厂、家具厂等，因为管理不善，几乎全部亏损！全村贷款达50多万元，其中30万元已到归还日期，金融部门已多次催讨。村里无计可施，已决定变卖土地和房产了。

粥店村已接近崩溃的边缘！

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，无力投资公共事业，村里小学、幼儿园、卫生室等，全都破烂不堪，勉强维持。村中大大小小街道，全都是土路，晴天尘土飞扬，雨天泥泞遍地。村西南设有集市，逢阴历的二、七开张，村子是必经之路，遇上雨天，四邻八乡来赶集的人一踏进村子，便不由得皱了眉头，千难万险地涉过了泥水，回头扔给粥店一个“荣誉”称号，啥粥店啊，干脆改名儿叫“猪圈”吧！

以前，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号，粥店人颇为气愤和不服；这次，连粥店本村人也觉得，这“猪圈”可真是名副其实啊！

## 新人出山

1993年和1994年，先后有两位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，一位干了不足一年，一位干了一年多，却有半年多生病住院。这位书记是个大老粗，开会发言，得有人给他写材料，不认识的字，还得注上个“白字”。两人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胜任，上级党组织只得着手再选，将全村党员来回扒拉了几遍（此时刘梅元还不是党员），竟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。

无奈，1995年3月24日，上级党组织将粥店办事处机关干部梁延平派来，担任粥店党总支书记（此前为党支部）。对此，村里的传言是，办事处领导跟梁延平谈话，说，你把粥店这个弯拧过来，要不就别回来上班了！

梁延平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梁书记虽然也是粥店人，因常年在办事处工作，对村里情

况并不太熟悉，工作一时无从下手。好在他遇到了一个好帮手，这个人便是村委副主任刘梅元，分管社会治安和民事调解，兼任村建筑公司副经理，干着两样工作，只拿着建筑公司一份报酬。早有人跟梁书记介绍说，刘梅元为人正派，善谋事，能成事，却行为低调，在哪儿都像一头老黄牛，脚踏实地，任劳任怨。此人无不良嗜好，却酷爱看报、学习，在建筑公司和村里威望很高……

他还更详细地了解到，刘梅元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和实践，拿到了建筑工程师职称——那时，农民评上工程师，还是很有场面的事儿。梁书记庆幸遇到了一位能够信任、可以依靠的人。在随后的分工中，村委工作由梁延平负总责，梁延平不在家时，由刘梅元代管政务。同时具体分管企业，并任低保主任、计划生育协会会长。这样，名义是副主任的刘梅元实际上履行着村委主任的职责。他以无私无畏的勇气，全身心扑在村里工作上，配合下派书记，使大乱之后的粥店获得了初步的休养生息。

1996年1月15日，村委换届选举，刘梅元被正式推选为村委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。此时，他还只是一位转正不久的中共新党员。

1997年3月22日，天边刚刚滚过第一声春雷，刘梅元又被任命为粥店村党支部书记。

在由上级党组织主持的权力交接仪式上，在“两委会”全体党员大会上，刘梅元谦虚地宣布：“本人服从组织决定，但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担此重任。在任期内一定团结其他同志，继续做好本村的各项工作，尤其是今年的调地工作！”

显然，这算不上“豪言壮语”，也许更多的还是“低调”。私底下，刘梅元还要“保守”得多。鉴于村里十分复杂的局面，他对于自己这个书记能否干长、也没有足够的自信。但他打定主意，即使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也要把钟撞响！

几句朴实无华的话，掀开了粥店发展史上新的一页。

## 重塑粥店

## 1.第一笔捐款

粥店村西有河，名畔河，发源于泰山西麓，宽约百米，自北向南流60华里，注入大汶河。水流长年不断，雨季河水暴涨，便会阻断行人，村人耕种、客商过往均极为不便。至清中叶，本村石匠姜桂松捐资修建石桥，名曰“通西桥”，粥店始成“通衢”。史载，姜公“不知书，以攻石起家，豁达好施，于贫乏多所赈贷”。相传，通西桥建成后，也有人说，姜石匠修桥不为别人，单是因为自家的地在河西，修桥只是为了自家耕作方便。姜石匠也不分辩，继续“攻石集资”，陆续又捐资修建了大汶河漫水桥、司家庄桥（又名广济桥）、三里庄桥，均有石碑为证。修桥石料，系几里外的枣行村所出，现枣行北有一片山坡仍叫姜家石窝。姜石匠后来被誉为“姜鲁班”，进入了泰山的光辉史册。

此时，刚刚当选为村支部书记的刘梅元漫步桥上，可谓感慨良多，2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，“不知书”的村民姜鲁班即有此几大善举，时至今天，绝大多数人早应该“知书达礼”，为何村仍乱得几乎无法收拾？光滑的石板桥上车辙深深，一项善举，方便百年多少人？他记得，9岁上学那年，读过几年私塾的爷爷专门给他讲过一个寓言，具体内容他已忘了，但寓意却深刻在心上：人活着，要先为他人着想，再为自己着想。那时，爷爷所在的互助组，就在他家里办公，仓库也设在他家，爷爷的寿棺，用来盛了互助组的种子。仓库从不锁门，也从没丢过东西。（当时的会计刘广汉说，刘家一家三代他都认识，都是公认的忠厚人。）如此淳厚的民风哪里去了？如何才能重树村风，唤回曾经的淳朴？

刘梅元苦苦思索着……

1997年4月12日下午，村民、家具厂承包人赵泽奎、孙继林将1996年奖金捐献给了粥店小学和幼儿园。赵泽奎捐出全部奖金1000元，孙继林捐出全部奖金200元，另外当场多捐300元，共捐500元。

近几年来，粥店村第一次有人无偿捐出如此“巨款”，刘梅元感到，这是一次重树村风、再塑粥店新形象的大好良机，便邀请了办事处倪庆军主任、宣传办张继峰、教育组孙新财来村里举行捐赠仪式，刘梅元及村委成员姜兴国、丁林香、王安荣及粥店小学校长梁传义一起参加。

此时，粥店也已脱胎换骨，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文明村”了。

## 2.“村约”发威

无处不在的粥店乱象，让很多正直忠厚的粥店人揪心。刘梅元分析，村子之所以乱，是因少数人只从一己私利出发，任意而为，而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。对于违法乱纪的事，村干部睁一眼闭一眼，平头百姓就更没理由管了。真正的村民对违法乱纪的人有意见，对村干部更有意见。

坏的风气得不到抑制，好的风气就难以形成，村里的各项事业就得不到健康发展。而要根治多年的痼疾，必须加强党组织建设，除发动村干部、党员率先垂范外，还必须有一部考虑周到严密而又切实可行的“根本大法”。

1997年3月29日，到任一周的刘梅元主持召开村党总支会议，当众宣布，书记工资按上级规定是404元，他仍旧拿380元；其他两委成员、工作人员按规定分别上调。针对村里工作人员作风拖拉、不按时上下班现象，实行全天候考勤，规范工作制度，制定了相应的奖惩措施；严格控制招待费、办公费支出，厉行节约；讨论通过粥店村基层组织建设设计计划，决定本年度培养村民梁传法、梁兴海、梁晓等3名入党积极分子；讨论并通过1996年3月31日由村民代表与村委共同讨论的《村规民约》——一套治理粥店村的规章制度诞生了。

同时，连夜分别召开党小组长、全体党员、村民代表大会，学习党章及有关廉政条例，严肃党的纪律，重树党组织和党员威望，鼓励全体党员做好经济发展的带头人、全体村民的表率。

对好的风气大张旗鼓地宣传，坏的风气则严格执行《村规民约》，以铁的手腕对付那些违法乱纪之人。

“村约”规定，禁止在河道以外的任何地方挖沙。一村民违反规定，刘梅元亲自找到他，跟他谈村里的规定，他羞愧地停止了，并按要求恢复了地貌。

为制止村民互相攀比房高的陋俗，“村约”统一规定了房高，超出者予以罚款或自行拆除。但仍有些村民不予理会，

随意超高建房。村里组成测量队，由周庆贵、姜兴国亲自带队，实地测量疑似超高房屋，发现有几家新建住房超高，责令这几户自行拆除。

一果农未经允许在北果园挖蓄水池，村里集体研究形成处理意见：损坏果树按《森林法》有关规定处罚，果树按年产果50斤计算，按3倍处罚，每损坏一棵责令其补栽两棵。蓄水池按面积增加承包额，即每亩水面每年100元。法制面前，该果农诚认错误。

有少数不孝子女打骂老人（有一人与老母亲争执某事，竟拧断了老母亲的胳膊；一老人下跪向儿子索取养老费而不得，拒付赡养费，这也违背了“村约”，村干部找上家门，勒令该不孝子到村里，严加批评，耐心说服教育，直至子女给老人道歉，如期如数交上赡养费。如再违犯，就要张贴上墙，暴露在全村老少爷们眼前。人要脸面树要皮，老少爷们眼前脸皮厚了能对付过去，还有孩子呢，孩子还有同伴、同学呢，孩子因此受了歧视，在同龄人面前抬不起头，那就剜了爹娘的心头肉了——不得不含羞改正）。

对欠村里果园、鱼塘、企业承包费的，由周庆贵、姜兴国负责，派村里得力人员一家催交。现任村委委员王安荣当时是“第一清欠人”，原来一些承包户，觉得承包是集体的事，总想找各种理由少交点钱，要不就拖着不交，似乎谁拖的时间长谁有能耐。按规定准时交的，倒成了傻瓜蛋，成了一些人耻笑的对象。现在不行了，你如不准时交承包费，又无正当理由，村里立马与你中止合同，与别人另行签订。承包毕竟有利可图，谁也不会眼见自己碗里的肥肉落在别人手里，又看到村里一视同仁，都顺当地交齐了拖欠的承包款……

此后，随着社会、经济的发展，《村规民约》多次重新讨论，重新修订，既约束着村民的行为，又是村民的保护伞。

## 3.旧貌新颜

集体收入回笼后，村里有能力为村民服务了。

投资改建、扩建了卫生室，修缮、绿化了学校、幼儿园；

美化、绿化粥店河两岸，昔日旧河道，成为粥店村一条风景带：

整顿村容村貌，清理路旁垃圾、粪坑、柴草、沙石等杂物，主要街道路面硬化；

治理小东河污染，让两岸饮用受污染的地下水的村民用上放心的自来水；

新上100KV变压器，不再因用电超负荷经常停电了；

同时，他们还多方筹措资金，购置6台打麦机及一批农业机械，无偿为村民打麦子；投资数万元，购置水力设施，免费为村民浇地。稍后，村民的“三提五统”、医疗保险也由村里统一支付，免除了村民的所有负担。

老年节为村里60岁以上的每位老人发一条毛巾、二斤白糖，虽是送鹅毛，礼轻情义重啊！

那些日子，刘梅元和村委一班人，可谓“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”，上午还雇农冠楚在会议室主持教授们的讲习班，下午就光着膀子来到地里，和村民一起抬电杆，架电线，修水渠，大搞农田基本建设。刘梅元至今还记得，一根电杆六七百斤重，几个人一下午不停手，晚上回家累得腰酸背疼，饭都不想吃了。

此时，刘梅元家中还种植着7口人的地，除他一家5口，还有母亲、弟媳的，一共4亩多，有些地块孬，分得还要多。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力，得先把集体的事干好，才能回家干自己的，麦秋两季，抢收抢种，累得要死。那时，村里还处在拨乱反正期，有些村民因为浇地、打麦等琐事，一不合适就吵架；还时有停电或者机器故障，有人来喊，他都得扔下自己正干的活路去处理好，回来才继续干自己的……

刘梅元对我感叹道，那时下了多少力啊！

年底，评选出“文明户”、“好媳妇”、“好婆婆”、“科技致富能手”，村里的锣鼓队敲锣打鼓把牌匾和奖品送到家门，引来多少由衷的赞叹和羡慕的目光。

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

无论村庄外部形象，还是粥店人的精神风貌，都焕然一新，再也没人说粥店是“猪圈”了。

这是刘梅元治村迈出的可喜一步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村民思想观念还会不断变化，刘梅元和村两委注定还要经过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。

## 公道之地

1997年早春，田边地头的野草还没冒绿芽儿，一场关于土地的话题已在村里暗中议论多时了。其时，土地承包是三年一小调、五年一大调，粥店属于丘陵、平原交叉地带，土地有肥有瘦，肥的地插上根拐棍能发芽；瘦的地，你就是像伺候亲老子一样，它也不领情，硬着心肠不给你回报。对于庄稼人来说，能够承包一份好地，等于交上了好运，似那平地里捡到了金子；如果承包了孬地，则无异于交了恶运，丢失了宝贝，一连几年都会感到窝心。

所以，为了承包到好地，就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一个几千人的大村子，家族、亲戚、朋友、同学等各种关系盘根错节，内中亲疏远近又各不相同。大权在握的村、组干部便成了全村瞩目的焦点，调地前，请客的、送礼的、拉关系的，挤破了干部的家门。调地时，有人如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照顾，只苦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家，眼看着一些上蹿下跳的人承包到了好地，而自己名下却是一些边角余料，心里那个火啊！还有人分到的地不如愿，抱怨村里不公。于是，告状的、吵架的、骂人的，撸袖子攥拳头找村干部打架的……乱哄哄一盘散沙。

以前，几乎历次调地都是如此。

现在，村里新换了书记，还会像以前一样吗？村民都在拭目以待，有些脑瓜精灵的人又像从前一样开始四处“活动”了。

很快，这些到处“活动”的人都碰上了“钉子”，带回来的消息是，此次调地大不同于往年，村里已经组织人马，将每块地估产后，按高产和低产两种，再根据各组人数，分别搭配编号，最后由每家代表抓阄，抓着哪块是哪块！

消息很快不胫而走，村民们将信将疑，空气中充满了期待的味道。

果然，村子显眼处张贴了几张大红“告示”：全村所有地块都标着号，似在等待大家认领。“告示”说，如有何意见，可以到村委提出，如无意见，三天后，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，按此标号抓阄决定各家承包地块。这个办法可真公正，也真新鲜！告示前，挤满了张眼观望的村民，大家评判着，争论着，感叹着，总之一句话，新村官要有“真事”了！

还有更令人叫绝的，正式抓阄前，先抓顺序号，按抓到的号依次开始抓“地块”，这样，等于又加了一层“公正”的保险。

几天后，全村12个村民小组顺利完成了调地任务，面对自己名下新的承包地，村民们心服口服，反觉得以前为分地打架斗殴的丑事恍如隔世了。

如此强有力的举措，如一阵大风，吹散了多年来笼罩在村民头上最厚的阴云，晴朗的天空下，村民们甚至觉得喘气也比